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6.020

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嬗变大势的初步确立者——曹植*

傅正义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和以《庄子》、《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中国诗歌长河的大势流变为“二源”合“一流”。曹植诗囊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这“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

关键词:曹植;中国诗歌;二源一流;建安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6-0114-04

一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源于南、北两大诗学体系。北方诗学体系以《诗经》为代表,南方诗学体系以《庄子》、《楚辞》为代表。《庄子》虽为文,但其中蕴含着浓郁的诗性精神,对后世诗人、诗歌的影响,并不逊于“诗骚”。一般说来,北方的冰山、茫茫雪原,赋与北方诗歌质朴阳刚之气,南方的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赋与南方诗歌绮丽阴柔之美;北方黄土高坡的艰苦的自然环境,赋与北方诗歌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南方鱼米之乡的相对富庶,赋与南方诗歌更多的浪漫主义气质。中国诗歌发展的大势走向,即这南、北诗学体系的振荡交融,“二源”合“一流”而汪洋恣肆,气象万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战乱分裂,这两大诗学体系虽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启发,产生过“磁场”效应,但基本上还是平行发展,并未真正的交融整合。秦汉天下一统,中国诗歌本应“二源”交汇,“南、北”合流,但时人忙于政权的巩固、制度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确立,特别是汉代人

人“尊《诗》为经,变《骚》为赋”,将《诗经》作了皇权政治的图解,将“长于幽怨”的楚辞变为“润色鸿业”的汉赋,反倒迷失了“风、雅”、“庄、骚”的诗性精神,至使秦汉文人诗坛一片荒凉。直到东汉末年,随着政权的腐朽、经学的衰微和子学的复兴,诗性精神才渐渐苏醒,出现了代表汉代人诗歌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建安时期,“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掀起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开创了中国古诗的黄金时代。而建安诗歌的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范温《诗宗建安》)^[1],披沙拣金,正本清源,恢复、继承并初步融合这南、北诗学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钱志熙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也谓“建安诗人的诗美观渊源于汉五言诗和汉乐府,也明显地受到《诗经》、《楚辞》的影响。”^[2]唐代以陈子昂为代表的诗歌革新运动一扫“六朝铅华”,标榜“风雅兴寄”、“汉

* [收稿日期]2011-05-21

[作者简介]傅正义(1949—),男,重庆人;教授,在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魏风骨”，后来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杜甫的“劣于汉魏近风骚”（《戏为六绝句》）等，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二源”合“一流”的诗学传统和大势走向。

二

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下开盛唐陈子昂、李白、杜甫诸人，初步确立中国诗歌长河“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这是建安诗歌一代繁盛的原因所在，也是建安诗歌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当然，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是建安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其中的大家手笔、天才诗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曹植作为“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而“独占八斗”（《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语）的贡献是特出的，这正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说：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3]真正以创作实绩初步融合南、北诗学传统，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曹操现存诗21首，皆为乐府，这已足见汉乐府对曹操的强大影响。曹操诗稿目时艰，肠断民瘼，反映了汉末的时代乱离和民生疾苦，也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表现手法，他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谣俗辞》、《却东西门行》等大量诗作，以事件为基本要素，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其情感抒写也总是缘事而发，这正是汉乐府艺术精神的典型特征。曹操诗古直悲凉、质朴刚健，与汉乐府的质朴刚健、率直任真也一脉相传。曹操诗写理想，抒豪情，将言志与缘情相结合，如《对酒》、《度关山》《短歌行·周西伯昌》、《短歌行·对酒当歌》、《步出夏门行》等诗作，则明显继承了汉末文人古诗言志抒情路子，有邴炎、仲长统等的《见志诗》、《述志诗》的遗风。曹操长于四言诗，似与《诗经》四言诗千载相关，然曹操四言诗，虽一定程度上受到《诗经》影响，但总体上讲，“非

《风》、《雅》体也”，“是乐府四言所自出”，并且“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谓曹操四言“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主要是源于汉乐府四言诗而非《诗经》四言诗。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和杂言楚辞体的风格，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中国的游仙诗有两个源头，一以屈原的《远游》、《离骚》为代表，言在仙趣，意在志讽，“籍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一以汉乐府游仙诗为代表，叹老嗟岁，乐生恶死，求仙访药，期求长生。而曹操游仙诗“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秋胡行》其二）“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陌上桑》），明显源于汉乐府游仙诗；虽然曹操也“不戚年往，世忧不治”，但毕竟与屈原“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远游》）、“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离骚》）的骚情牢落，不是一回事；曹操的杂言体也与楚辞杂言体相差有间，更接近汉乐府三、七言相杂的体式。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操诗的艺术渊源，主要还是出自汉乐府和汉末文人古诗，尤以汉乐府的影响最大。

曹丕现存诗40余首，然乐府诗就有25首，占了近60%的比重，并且与曹操一样，同为“乐府妙手”（钟惺《古诗归》卷七），“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曹丕工于言情，一半以上的诗作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并且如《燕歌行二首》、《杂诗二首》等大量诗作，已摆脱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套路，多选择“秋风萧瑟”、“白露寒霜”、“草虫悲鸣”、“孤雁南翔”等“意象”来立象见义，抒写性情，或“贱妾莹莹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不复陈，客子常畏人。”采取直抒胸臆的手法，这与“《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刘熙载《艺概》卷二）的艺术精神相同，而与汉乐府强烈的叙事性和情附于事的手法不类。刘熙载所谓“百端交集”乃谓《十九首》的强烈抒情性，与汉乐府的明显叙事性不同；所谓“凿空乱道”，乃指《十九首》或直抒胸臆或立象见义，与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不同。所以陈祚明《采菽堂古

诗选》卷五谓曹丕“其源出于《十九首》”。(应该说,曹丕诗主要源于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尤以《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更大。另外,钟嵘《诗品》卷中谓曹丕诗“其源出于李陵”,而李陵“其源出于楚辞”,于是学术界有人断言曹丕主要受楚辞的影响。其实不然,曹丕诗虽也多少受到楚辞的影响,如《寡妇诗》“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但曹丕诗中缺乏屈原的强烈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曹丕还写了约占其诗四分之一比重的四言诗,如《短歌行》、《秋胡行》、《善哉行》、《丹霞蔽日行》、《煌煌京洛行》等,这与曹操四言诗一样,也是“属于乐府四言体,而非《诗经》四言体”^[4]。曹丕还写有少量杂言体诗,这也与曹操杂言一样,主要受汉乐府杂言体的影响。

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大多为徒诗,乐府诗较少,并且王粲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皆与《古诗十九首》相差有间,所以王世贞《艺苑卮言》有云:“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干,便觉自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经》的影响,这正如徐祜卿《谈艺录》所说,王粲“得之二《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也谓其“直嗣二《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也称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读王粲诗中近三分之一的四言徒诗(非乐府四言),这一点也显而易见。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鄜中集·王粲诗序》),多抒遭乱流寓之情、怀才不遇之苦、思定思治之叹,与长于幽怨之情的楚骚相近,故钟嵘《诗品》卷上谓王粲诗“其源出于李陵”,刘熙载《艺概》卷二谓“王仲宣诗出于骚”,这是很有艺术眼光的。王粲诗辞采华美,“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也与《诗经》的古拙、汉乐府的质朴和《古诗十九首》的平淡不类,而与楚辞的“朗丽”、“绮靡”(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相似。

刘祜存诗近20首,无乐府,皆徒诗。其诗多用比兴或直抒怀抱,故钟嵘《诗品》卷上称刘祜“其源出于古诗”,张玉毅《古诗赏析》卷九谓其“本于国风”。阮禹存诗12首,其中乐府1首,徒诗11首,“平典不失古体”(钟嵘《诗品》卷下)。

“建安七子”中陈琳、应场、徐干存诗太少,不足论。

曹植存诗96首,其中乐府诗51首,占其诗53%,并且“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如《门有万里客行》、《泰山梁甫行》、《美女篇》、《七哀诗》等大量乐府诗,很得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神韵。曹植“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惺《古诗归》卷七),写了不少游子、思妇诗,特别是《杂诗·南国佳人》、《杂诗·西北有织妇》、《杂诗·揽衣出中闺》等,“全法《十九首》意象,不能辨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而曹丕的游子、思妇诗,是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曹植的游子、思妇诗则大多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以浮萍、飞蓬自比身世沉浮,这又继承的是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曹植还写了大量游仙诗,虽也“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忘。”(《飞升篇》),“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平陵东行》)有服食成仙,期求长生的一面,这显然受到汉乐府游仙诗的影响,受到庄子道家思想,包括道教思想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仙人篇》)“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游仙》)更多的是“忧生之心”、“忧患之词”(朱乾《乐府正义》卷五),更多的是上承屈原《远游》之意,“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曹植志向高远,性行端直,然上不能取信于君,下不能见容于俗,“忠言而见黜”、“长自弃于遐滨”(《九愁赋》),与屈原遭遇相似,所以曹植对屈赋艺术精神的学习和体会是相当自觉的,对《庄子》远祸全身思想的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钱志熙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说得好:曹植的游仙诗“皈依于庄骚结合的艺术境界。由于当时的道家常常与道教混合,所以曹植能比较自然地借助游仙的形象寄寓这种艺术精神。……这些诗自然受到乐府游仙诗的影响,但曹植诗中融进‘骚’的精神,隐含政治上的感慨,却是乐府民歌所没有的。”^[5]“通过曹植,《庄》、《骚》的艺术精神得到了复活,……这是曹植对中国诗歌史的一大贡

献。”^[6]曹植还以“有应《风》、《雅》”(《与杨德祖书》)相标榜,将“与《雅》、《颂》争流”(《前录自序》)作为自己作诗、选诗的标准,曹植诗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及赋、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的确是“其源出于《国风》”(钟嵘《诗品》卷上),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卷一也称曹植为“《风》、《雅》之苗裔”。曹植诗歌代表作《赠白马王彪》,章法上的顶真蝉连,显然仿效了《诗经·大雅·文王》,其中“鷓鴣”、“豺狼”、“苍蝇”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也类似《诗经·小雅·青蝇》。所以钱志熙又评价曹植“将儒家的文学传统和《庄》、《骚》的文学精神融合到五言诗和乐府诗中。曹植诗歌中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比起汉末和建安的其他诗人来要突出得多。”^[7]黄节的《曹子建诗注·序》说得更为精炼:曹植“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8]

三

综上所述,建安诗歌“鸿才接踵,上薄《风》、《骚》”(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凡例),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隳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的诗人,当首推曹植。所以丁晏的《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有云:“《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颞门,首推子

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卷五也谓“子建之诗,隳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也是将曹植作为上承《风》、《雅》、《庄》、《骚》、《汉乐府》、《十九首》,下开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的正宗传人推崇,作为中国诗家的“正轨颞门”、“正派的宗”来标榜,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诸多贡献中的第一大贡献,正因为此,“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吴乔《围炉诗话》),把曹植与李白、杜甫并尊为“古今三大诗家”(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或把曹植、陶潜、李白、杜甫合称为“四大诗圣”(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从中国诗歌长河的“二源”合“一流”的大势嬗变来看,的确不是过誉之论。

[参考文献]

- [1] 范温. 诗宗建安[A]. 三曹资料汇编[C]. 中华书局, 1980:250.
- [2] [4] [5] [6] [7] 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15. 66. 165. 170. 167.
- [3]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35.
- [8] 黄节. 曹子建诗注·序[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责任编辑:朱德东)

Caozhi—the Initial Founder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Streams of Chinese Poetry

FU Zheng-y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two mainstreams are the North poetry and the South poetry, the North poetr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Shijing and the South poetr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Chuci. And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poetry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aozhi's poetry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Shijing, Chuci, Hanyuefu and the Nineteen poem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e is the first founder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which was his bigges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 Caozhi; poetry of China; combination of two main streams; poetry in Jianan Period